

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汉语借词的拼写

正月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包含梵藏语借词、汉语借词和其他一些借词。其中汉语借词的一部分成为当时蒙古语常用词汇的一员, 另一部分则为临时借入蒙古语的汉语词。该文阐释这些汉语借词, 并对一部分借词的形式同《蒙古字韵》的对应形式进行了对比。

关键词: 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 汉语借词; 拼写特征

中图分类号: H212

文献标识码: A

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在整个蒙古语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研究中世纪蒙古语和蒙古语言历史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数量并不多, 但是与元代有关的 60 余篇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包含了梵藏语借词、汉语借词和其他借词。本文对这些文献中出现的汉语借词进行了专门搜集和分析, 得知那些借词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或在中世纪蒙古语)中的角色各不相同。^①那些汉语借词的大部分为地名、寺名、人名、官职名、机构名和法名等专用名称。其中有意译而来的汉语词, 这类词出现的数量很少, 在我们所掌握到的文献中只有一个“ ᠳᠡᠭᠲᠡᠷᠡ degter_e”一词。也有一部分词是逐渐融入到蒙古语常用词汇的一些词, 这种汉语借词为数也不多。另有绝大一部分词是临时因特殊需要而借入的汉语词。这部分词被叫作借词虽然有些牵强, 但是考虑到题目概括性的需要, 把它们临时纳入借词行列中。

ᠳᠡᠭᠲᠡᠷᠡ degter_e 一词出现于《曲律皇帝鸡年圣旨》(1309)的末尾一行, 是地名“龙虎台”一词“台”的蒙古语意译对应形式, 这里没有翻译“龙虎”二字, 以“台”对应的 ᠳᠡᠭᠲᠡᠷᠡ (degter_e) 代替了“龙虎台”。笔者根据该词只在上面提到的圣旨里出现并与汉语地名“龙虎台”对应, 故视之为汉语借词的意译形式。

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出现的其余汉语借词一部份是逐渐进入蒙古语常用词汇中的词语, 另一部分则为临时借入蒙古语的汉语词。下面分别讨论这两种汉语借词。

一、进入蒙古语常用词汇的汉语借词

这种借词在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和一些回鹘式蒙古语文献中出现, 且出现频率较高, 因此

我们视其为中世纪蒙古语常用词汇中的一员，它们在语音形式上仍然保持汉语语音的特征。

(一) **ᠰᠢᠰᠢᠩᠭᠦᠳᠦ** *senshiṅ (ud)* **ᠰᠢᠰᠢᠩᠭᠦᠳᠦ** *senshiṅ (ud)*

该词（_ud 是蒙古语名词复数附加成分）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基本上在圣旨、令旨、懿旨、法旨等皇帝、王公、皇太后、长老等授予汉地、藏地的和尚和先生们的公文诏书中均出现（除《也孙铁木尔皇帝龙年圣旨》1328、《妥欢帖睦儿皇帝虎年圣旨》1362 等少数文献除外）。该词指道教人员。其八思巴字形式为 *sen shiṅ* 和 *sén š hiṅ* 两种，回鹘式蒙古文形式为 **ᠰᠢᠰᠢᠩᠭᠦᠳᠦ** *šišingūd*（《忽必烈皇帝鸡年、龙年圣旨》即 1261 年圣旨第 8 行，1268 年圣旨第 11 行。）。该词在元代白话汉译中的对应形式为“先生”。

(二) **ᠳᠡᠮ** *dēm*

该词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出现的情况同于“先生”。其回鹘式蒙古文形式为 **ᠳᠡᠮ** *dēm*（《忽必烈皇帝鸡年圣旨》1261 第 22 行、《忽必烈皇帝龙年圣旨》1268 第 26 行）。元代白话汉译中的对应形式为“店”。该词从未出现单独使用的例子，常与蒙古语 *kebid* 并行出现，可见“*dēm (den) kebid*”（店铺）这样的汉蒙混合词语已经成为中世纪蒙古语常用词汇。

(三) **ᠲᠤᠰ** *ts ‘aṅ*

该词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出现的频率高于上面提到的两个词，在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令旨、懿旨等中均出现（除《妥欢帖木儿皇帝马年圣旨》1342 这样损坏程度较严重的碑文），上述两个词未出现的一些诏书中仍然见到该词。其回鹘式蒙古文形式为 **ᠲᠤᠰ** *sang*（《忽必烈皇帝龙年圣旨》1268）第 22 行以 **ᠲᠤᠰ ᠠᠮᠤ** *sang amu* 的形式出现，意为税粮）。在元代白话汉译中有“粮”（《普颜笃皇帝牛年圣旨》1313）“地税”（《薛禅皇帝龙年圣旨》1280）“税粮”（《完者笃皇帝狗年圣旨》1298）等对应形式。在回鹘式蒙古文上述忽必烈皇帝两则圣旨碑文中，均出现了 **ᠰᠢᠰᠢᠩᠭᠦᠳᠦ ᠰᠤᠲᠠᠮᠤ** *sui tamv_a*（第 20 行、第 24 行）的形式，因此该词有“税”之意是无可置疑的。该词也作为地名在《普颜笃皇帝虎年圣旨》1314（4）中出现，如 **ᠴᠠᠬᠠ ᠲᠤᠰ** *čaqa ‘a ts ‘aṅ_a*，其元代白话汉译为“察罕仓”。显然该词也已进入蒙古语常用词汇并沿用至今。在现代蒙古语中其意为“仓库”、“汇”（词汇）等。

(四) **ᠭᠡᠳᠡᠨᠬᠤ** *gey dèn k ‘u*

该词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反复出现，*gey dèn k ‘u* 形式为居多，而有时被写做 **ᠭᠡᠳᠡᠨᠬᠤ** *gei dèn k ‘u*（《普颜皇帝马年圣旨》1318，第 18 行。）**ᠭᠡᠳᠡᠨᠬᠤ** *giay dèn k ‘u*（《普颜皇帝牛年圣旨》1313，第 23 行）等形式。回鹘式蒙古文形式为 **ᠭᠡᠳᠡᠨᠬᠤ** *gei den kütü*（《忽必烈皇帝鸡年圣旨》1261，第 22 行），其元代白话汉译中的对应形式为“解典库”，指典当铺。

(五) **ᠭᠡᠭᠦᠩᠭᠣᠨ** *geuṅ gon*

该词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也反复出现，有时以 **ᠭᠡᠳᠡᠨᠬᠤ** *gon_dür* 的形式出现（如《阿难答秦王马年令旨》1282，第 14 行。），还有在《安西王忙哥刺鼠年令旨》1276 中以 **ᠭᠡᠭᠦᠩᠭᠣᠨ** *guaen (_dür, 第 15 行。)* 形式出现。该词未曾在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中出现过。其元代白话汉译对应形式

为“宫观”。

(六) **ᠤᠭᠡ ᠤᠯᠦ** 'i ji

该词在答吉皇太后两篇懿旨中均有出现。在答吉皇太后两篇懿旨中，该词共出现了八次，其中有 **ᠤᠯᠦ ᠤᠯᠦ** "持有懿旨"（《答吉皇太后猴年懿旨》1320，第28行）这样附加蒙古语形容词构词词缀的用例。《答吉皇太后鸡年懿旨》1321中的元代白话汉译为“懿旨”，指女性权威者下发的命令，即皇太后令。回鹘式蒙古文对应形式为 **ᠤᠭᠡ ᠤᠯᠦ**（回鹘式蒙古文《十方大紫薇宫窝阔岱皇帝圣旨》，第1行）。

(七) **ᠰᠠᠭᠢ ᠮᠣᠯᠤ** fajī

该词出现于《帝师公哥罗古罗思坚藏班藏卜鸡年法旨》1321中，共出现了四次。其中有 **ᠰᠠᠭᠢ ᠮᠣᠯᠤ ᠨᠠᠳᠤ** fajītu 这样附加蒙古语形容词构词附加成分的用例。其元代白话汉译形式为“法旨”，指宗教头领下发的命令。

相对而言，回鹘式蒙古语文献中常常以 **ᠤᠭᠡ ᠪᠢᠴᠢᠭ** bičig 的形式出现的指“王、公、罕”命令的词在回鹘式蒙古文《云南王阿鲁碑》1340中以 **ᠯᠢᠩᠭᠢ** lingji 的形式出现，这是汉语“令旨”一词的对音形式。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没有出现与 **ᠤᠯᠦ ᠤᠯᠦ** 'i ji、**ᠰᠠᠭᠢ ᠮᠣᠯᠤ** fajī 相对应的 **ᠯᠢᠩᠭᠢ ᠮᠣᠯᠤ** lipji 形式。由于蒙古语有 **ᠤᠭᠡ ᠪᠢᠴᠢᠭ** bičig 这样固定指“王、公、罕”指令的词所以 lipji 形式没有被蒙古语借用。因此，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安西王忙哥刺鼠年令旨》1276、《阿难答秦王马年令旨》1282、《小薛大王兔年令旨》1303、《海山怀宁王蛇年令旨》1305中均出现 **ᠤᠭᠡ ᠮᠣᠯᠤ** 'üge, **ᠪᠢᠴᠢᠭ** bičig 形式，这与回鹘式蒙古文文献相一致。

在《曲律皇帝鸡年圣旨》1309、《妥欢帖睦尔皇帝兔年圣旨》1351等少数几个圣旨碑文中出现了汉语“庄田”的对音形式 **ᠵᠠᠮᠠᠨ ᠲᠡᠨ** ḡap tēn。这个词虽然与上述“解典库”之类一样指寺庙所属固定资产的一种，但是其出现数量不多，没有被广泛运用于蒙古语。

之所以把上述汉语借词视为进入当时蒙古语常用词汇的一员，除了它们被使用频率较高外，它们具备了蒙古语名词的基本特征。即可有格变化和附加名词构词词缀等特征。

例如，**ᠰᠡᠩᠰᠢᠬᠢ ᠤᠳ** sēnshih (ud) 这样附加名词复数后缀的现象很普遍。又如：**ᠤᠯᠦ ᠤᠯᠦ ᠨᠠᠳᠤ** 'ijit 'u(tu 为名词构词词缀)；**ᠤᠯᠦ ᠤᠯᠦ ᠨᠠᠳᠤ** 'ijit 'en (持有懿旨的，《答吉皇太后猴年懿旨》1320, _ten 为名词构词词缀) 等等。

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另有一些词语是汉语词与蒙古语词的混合形式，如：**ᠰᠠᠭᠢ ᠮᠣᠯᠤ ᠶ᠋ᠠᠨ ᠶ᠋ᠢᠨ** fa oṅqoč 'os (《普颜皇帝虎年圣旨(3)》1314，第19行。)，**ᠬᠡᠯᠡᠭᠴᠢᠨ ᠪᠤ ᠤ ᠶ᠋ᠠᠨ** 'āqa 'an tsap_a (《普颜笃皇帝虎年圣旨(4)》1314，第43行。) 等，这也说明 **ᠰᠠᠭᠢ** (伐) **ᠬᠡᠯᠡ** (仓) 等借词已被蒙古语常用词汇所吸收。

另有一个汉语词“献”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以其动词的性质被借用。如：**ᠬᠡᠯᠡᠭᠴᠢᠨ ᠲᠡᠭᠡᠢ** henletügeè (施献，《普颜皇帝虎年圣旨(4)》1314，第37行。_tügeè 为动词第三人称祈誓式词缀)、henlegčīn (施献的人，《普颜皇帝虎年圣旨(4)》1314，第37行。_le 为动词第三人称祈誓式词缀、_gčīn 为名词构词词缀。显然后者的附加不符合蒙古语构词规律)。

二、临时借入蒙古语的汉语借词

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多数为官厅文书，是皇帝、皇太后、王及帝师等向军官、士兵、各城子达鲁花赤官员、往来的使臣们宣谕的圣旨、懿旨、令旨及法旨。各个官厅文书的主要内容是向接受宣谕的各级人员传达成吉思汗以来各代皇帝所执行的例规即免除各宗教寺院的差役和赋税。这些官厅文书和其他一些文献中涉及到诸多汉语地名、人名、官名及其他专有名词的八思巴字蒙古语对音词。这种汉语词在其他蒙古语文献中重复出现的可能性很小，因此笔者视其为临时借入的汉语借词。这些汉语词约有二百六十多个，涉及的汉语韵类达十五种。我们参照那斯图、杨耐思两位先生编著《蒙古字韵校本》和杨耐思先生所著《中原音韵音系》一书对这些汉语词的八思巴字拼写形式及韵类进行了对比。这些词除了一小部分与《蒙古字韵》的写法不同或没有在《蒙古字韵》里被收录外其余大部分与《蒙古字韵》的写法相一致。下面将探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内部形式上具有差异的部分汉语词和同《蒙古字韵》拼写形式不同的部分汉语词。

（一）汉语“阳”韵类词韵母的不同形式

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对同一汉字即“阳”韵类词韵母拼写有运用 \vee (ia) 和 \mathcal{U} (ial) 两种形式的不同，其对应形式在《蒙古字韵》中均以 \mathcal{U} (ial) 形式出现。如：《普颜笃皇帝鼠年圣旨》(1312) 的第 18 行 $\mathcal{M}\mathcal{U}\mathcal{L}$ ziaŋ (相)，在《蒙古字韵》中为 $\mathcal{R}\mathcal{U}\mathcal{L}$ sialŋ。《普颜笃皇帝南华寺圣旨》(1) 的第 23 行 $\mathcal{S}\mathcal{V}\mathcal{U}$ hiaŋ (巷)，在《蒙古字韵》中为 $\mathcal{S}\mathcal{U}\mathcal{U}$ hialŋ。显然《蒙古字韵》以 \mathcal{U} (ial) 形式标记该类韵母。

这种 \vee (ia) 和 \mathcal{U} (ial) 的不同使用也出现在其他韵类上，如《普颜笃皇帝南华寺圣旨》(1) 第 19 行写为 $\mathcal{R}\mathcal{U}\mathcal{L}\mathcal{G}$ gialw (觉)，而在《完者笃皇帝马年圣旨》(1294) 第 9 行中写为 $\mathcal{R}\mathcal{U}\mathcal{L}\mathcal{G}$ giaw。另外“解典库”的“解”在《薛禅皇帝龙年圣旨》(1280) 第 2 行中的形式为 $\mathcal{R}\mathcal{U}\mathcal{L}\mathcal{G}$ gialy，而在《完者笃皇帝狗年圣旨》(1298) 第 22 行中的形式为 $\mathcal{R}\mathcal{U}\mathcal{V}$ giay。从八思巴字的字形来源看 \vee 与原藏文形式一致，《蒙古字韵》采用了 \mathcal{U} 形式，它也与八思巴字字母第二个元音字母一致。

（二）汉语“先”韵类词韵母的不同形式

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对这类韵母采用 \mathcal{U} e 和 \mathcal{V} è 的不同形式。如：“先生”的“先”在多篇文献中均为 $\mathcal{R}\mathcal{U}\mathcal{S}$ sen，而在少数文献如《安西王忙哥刺鼠年令旨》(1276) 的第 6、13、17 行、《薛禅皇帝牛年圣旨》(1) 第 8 行中均为 $\mathcal{R}\mathcal{V}\mathcal{S}$ sèn 形式。店铺的“店”在多篇文献中以 $\mathcal{K}\mathcal{V}\mathcal{S}$ dèm 的形式出现，如《普颜笃皇帝鼠年圣旨》(1312) 第 24 行，但是在少数文献如《薛禅皇帝龙年圣旨》(1280) 第 22 行中为 $\mathcal{K}\mathcal{U}\mathcal{S}$ dem 形式。“解典库”的“典”的拼写也是如此，多篇文献中为 $\mathcal{K}\mathcal{V}\mathcal{S}$ dèn 或 dèm 形式如：《曲律皇帝鸡年圣旨》(1309) 第 17 行为 $\mathcal{K}\mathcal{V}\mathcal{S}$ dèn，《完者笃皇帝狗年圣旨》(1298) 第 22 行为 $\mathcal{K}\mathcal{V}\mathcal{S}$ dèm，但是在少数文献如《薛禅皇帝龙年圣旨》(1280) 第 23 行为 $\mathcal{K}\mathcal{U}\mathcal{S}$ dem 形式。 $\mathcal{K}\mathcal{V}\mathcal{S}$ dèn 形式与《蒙古字韵》相一致。

（三）汉语一些声母的不同形式

这里的“不同”是指《蒙古字韵》的声母与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同一声母的字形差异。汉语地名“重阳”的“重”在《蒙古字韵》中列在“东”韵类“euŋ”韵部中，拼写形式为 $\mathcal{M}\mathcal{U}\mathcal{L}\mathcal{U}$ ，声母是 tš。而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有 $\mathcal{L}\mathcal{U}\mathcal{L}\mathcal{U}$ džeuŋ（《妥欢帖睦尔皇帝羊年圣旨》(1343) 第 13 行）和 $\mathcal{L}\mathcal{U}\mathcal{L}\mathcal{U}$ džeuŋ（《妥欢帖睦尔皇帝兔年圣旨》(1351) 第 23 行）形式，其声母为 dž。《蒙古字韵》中 $\mathcal{L}\mathcal{U}\mathcal{L}\mathcal{U}$ džeuŋ 形式的“松”“冲”字、 $\mathcal{R}\mathcal{U}\mathcal{L}\mathcal{U}$ seuŋ 形式的“嵩”字、在八思巴字蒙

古语文献中分别为 $\mathcal{S}\mathcal{L}\mathcal{O}\mathcal{L}$ seuj (松, 《普颜笃皇帝牛年圣旨》(1313)第18行)、 $\mathcal{L}\mathcal{O}\mathcal{L}$ džuj (冲, 《普颜笃皇帝马年圣旨》(1318),第16行)和 $\mathcal{M}\mathcal{L}\mathcal{O}\mathcal{L}$ zeuj (嵩, 《普颜皇帝鼠年圣旨》(1312),第17行)等形式。另有“祥”、“相”、“常”等字在《蒙古字韵》中的形式分别为 $\mathcal{M}\mathcal{L}\mathcal{L}$ zialŋ、 $\mathcal{S}\mathcal{L}\mathcal{L}$ siaŋ、 $\mathcal{L}\mathcal{L}$ šaŋ, 而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分别为 $\mathcal{S}\mathcal{L}\mathcal{L}$ sialŋ(祥, 《普颜笃皇帝虎年圣旨》(1314-2),第16行) $\mathcal{M}\mathcal{L}\mathcal{L}$ ziaŋ(相, 《普颜笃皇帝鼠年圣旨》(1312),第18行) $\mathcal{L}\mathcal{L}$ dzaŋ(常, 《普皇笃皇帝虎年圣旨》(1314-4),第36行)。又如:“于”字在“曲律皇帝鸡年圣旨”(1309)的形式为 $\mathcal{S}\mathcal{L}\mathcal{O}$ 'eu(第13行),而在《蒙古字韵》的形式为 $\mathcal{L}\mathcal{L}\mathcal{O}$ 'eu。另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在《蒙古字韵》中用 \mathcal{L} 和 \mathcal{L} 分别标记“审”类和“禅”类声母,而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并没有刻意区分这两种声母,均以 \mathcal{L} 来拼写。如:《普颜笃皇帝虎年圣旨》(1314)第4、5行的 $\mathcal{S}\mathcal{L}\mathcal{O}$ $\mathcal{L}\mathcal{L}\mathcal{S}$ $\mathcal{L}\mathcal{S}\mathcal{L}$ (御史台)、《普颜笃皇帝南华寺圣旨》(1)的第21行 $\mathcal{L}\mathcal{L}\mathcal{L}\mathcal{S}$ $\mathcal{M}\mathcal{L}\mathcal{S}$ (禅寺)等等。

(四) 汉语有些声母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具有不同形式

如“普”字在《普颜笃皇帝南华寺圣旨》(1)的形式为 \mathcal{P} p' (19、22行),而在《居庸关石刻》(西壁)为 \mathcal{P} b 的形式(14行)。 \mathcal{P} p' 与《蒙古字韵》一致。

《蒙古字韵》用 \mathcal{S} ha \mathcal{S} ha 分别区分汉语“晓”类声母和“匣”类声母,而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这两类声母的区别不是很严格,如同在《普颜笃皇帝虎年圣旨》(1314-1)之第15行的“县”和“化”字写做 $\mathcal{S}\mathcal{L}\mathcal{L}\mathcal{S}$ huən、 $\mathcal{S}\mathcal{L}$ hua, 声母在八思巴字的形式上没有区别。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却把“晓”、“阐”类声母与“奉”类声母分别用 \mathcal{S} ha 和 \mathcal{S} hu 形式区分,在此不作一一列举。

总之,一些汉语词借入蒙古语后其韵母和声母在八思巴字形式上有所变化或差异。这种变化或差异对阐明汉语音韵学发展史多少会有些参考价值。由于本人在汉语音韵学方面知识不足,这里只好把“问题”摆出来,供相关专家和同仁进一步深究其由来。

注释

①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汉语借词的拼写情况,作者主要参考呼格吉勒图、萨如拉编著的《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汇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在此基础上也参考了照那斯图先生编著并在日本出版的《八思巴字与蒙古语文献》I 文献汇编、在研究过程中主要参照那斯图先生《八思巴字与蒙古语文献》·II 研究文集,八思巴字的转写参考了照那斯图、杨耐思先生编著《蒙古字韵校本》(民族出版社,1987年)。

On Transliteration of Chinese Loanwords of Mongolian Materials in the Phags-pa Script

Chagansar

(School for Mongolian Studies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21)

Abstract: Mongolian materials in the Phags-pa Script includes loanwords of Sanskrit、Chinese and some others. Some Chinese loanwords developed into basic Mongolian vocabulary, some was borrowed temporary from Chinese into Mongolian among them. This paper examines Chinese loanwords, and contrasts some Chinese loanwords with the corresponding forms of that in *Monggol zi yun*.

Key words: Mongolian materials in the Phags-pa Script; Chinese loanwords; transliterating feature

收稿日期: 2012-03-20;

作者简介: 正月 (1968-), 女, 蒙古族, 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副教授, 语言学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世纪蒙古语、蒙古古文字与古文献、蒙古语言研究史等方面的研究。